

# 第一章

## 研究述评

### 第一节 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

自从半个世纪前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及其理论体系以来，通过中外学者的不懈探索，文化生态学研究在多学科领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是至今依然没有全面系统的文化生态学理论问世。涉足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有关学科，由于受各自的学术视野局限，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其操作的文化生态学概念体系与理论要义有较大差别，存在种种缺陷与不足，突出表现为系统性差、兼容性弱。其理论分布与水平的这种状态固然是学科成熟必经之途，然而，在世界性的许多问题明显源于人类自身，生态观与生态方法日益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思想，从而使人类与环境关系研究迅速增强的今天，文化生态学加快其学科理论建树，提升其在相关学科的应用水平就显得十分必要。地理学，尤其是文化地理学在文化生态研究中有自身优势，是人所共知的。为此，文化地理学一直将文化生态学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之一。遗憾的是，迄今文化地理学仍未对文化生态学做出特别的理论贡献。发挥地理学区域研究与系统综合研究特长，整合既有文化生态学理论，形成新的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以促使其独立发展，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述评

### 1. 源于人文地理学的文化生态理论

人地关系一直是地理学传统的研究主旨所在。现代人地关系研究表明，文化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表现为文化调控人们的生产方式，制约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最终成为构成地域特征的重要因素。为此，文化被看做是人与自然的契合点。文化被理解为人类在环境中形成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复合体<sup>1</sup>。索尔有关文化景观的卓越研究使文化地理学研究文化的特长显见，文化景观学派曾风靡一时。直至今日，在美国文化地理学几乎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代名词。在吸收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化地理学从时空双向维度，藉以地域系统观的指导不断增进着对文化生态学的认识。生态观点被理解为人类及其行为与环境，加之时间、空间和生产关系的三角态势的评判<sup>2</sup>。Kent Mathewson 觉察了文化、景观与生态研究终将走向统一的趋势<sup>3</sup>，认识到人类圈只是全球系统五元系统之一<sup>[4]</sup>，建立了“环境感应与行为学说”、“人类营力”及“人地关系供求学说”<sup>[5]</sup>。现在文化生态学研究已成为文化地理学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文化地理学者认为文化生态侧重研究有文化的人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尤其重点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化产生、发展的影响和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迄今为止，地理学界已出现的文化生态理论有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然论、适应论、感应论以及文化决定论。它们对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可借鉴性，但也有各自的不足<sup>[6]</sup>。有学者深刻认识到，从本质上和总体上讲，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为人类社会保留了相当广泛的自由。因为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远未达到极限，其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不同的利用程度和方式的产物<sup>[7]</sup>。生态环境在民族文化演进中的历史地位是可变的。生态环境在个别环节，特别是在民族文化源头上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sup>[8][9]</sup>。这是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我国经过半个多世纪批评的理性反思<sup>[10]</sup>。

近二十年来，文化生态的宏观地理研究在我国的推进重点表现为：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协调的和谐论成为流行趋势。这迎合了 20 世纪后半叶人本主义在我国兴起的潮流，并由此直接引发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使之成为人地关系研究新热点<sup>11</sup>。近年来，行为理论也被运用于文化生态乃至文化地理其他领域<sup>12</sup>。伍家平据对侗文化剖析提出“民族文化地理系统”概念<sup>13</sup>。无疑，人对环境的适应研究是地理学者从事文化生态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sup>14[15][16]</sup>。从这一角度认识人地关系的互动特征，探讨人类活动与环境变

化的动态关系，是当前科学研究的新课题。IGBP组织的2000年人与环境适应研究就是明证。韩茂莉与此相关的研究发现，由于人类自身对环境变化的感知能力与能动反映，人类调整生产与生活的每一次文化行动，都可以作为人地互动信息的反映<sup>17</sup>。对环境历史地理学的众多研究表明，人地矛盾由来已久，其中有自然环境自身剧变的原因。近现代则更多表现为文化生态不适的原因<sup>18和19</sup>。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文化地理学对文化生态研究有其自身的优势，但既往的研究事实说明，文化地理学未能提炼出有自身特色、深层系统的文化生态理论。这里不是将人地关系论的加积视为文化生态理论，就是对相邻学科理论的简单借用，权作一时之宜问题在于，人地关系论不但未成统一的理论，从层次上和侧重点上都满足不了作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的需要。文化生态学在文化地理学中的生存与发展呼唤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重构。

## 2. 源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生态理论

文化生态学主要由美国文化进化论学者斯图尔德创立。斯图尔德在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专著中完整阐述了其主张的文化进化理论，即文化—生态适应理论。他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个适应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它重点阐明不同地域环境下文化的特征及其类型的起源，即人类集团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环境的自然资源，如何适应其他集团的生存，也就是适应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sup>20</sup>。在斯图尔德构建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大厦中，文化核心、文化类型、社会文化整合水平等是重要概念。斯图尔德认为在一个文化系统内，总有一组文化特征构成其核心。当该文化适应环境并形成其特性时，以经济为中心的互相联系的一组文化特性就表现出很大的作用，从而成为该文化系统的决定因素。文化类型由核心特征组成，同一类型文化的生态适应和整合水平是一致的。社会文化整合水平可以理解为社会文化本身的不同层次、水平、等级以及文化和社会互相作用产生的水平。换言之，环境适应产生核心特征，核心特征造就文化类型且体现社会文化整合水平。斯图尔德主张通过分析技术与环境的关系、分析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区的行为方式以及确定环境开发中行为方式影响文化其他方面的程度等途径检验文化核心的环境适应。总之，斯图尔德用文化生态学解析文化差异和相似，试图概括文化规律、文化变迁的原因。其理论核心是环境、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因果关系理论，最终认为在生态条件和技术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社会政治结构就类似。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怀特（L. A.

White) 认为它是历史特殊论模式<sup>[21]</sup>。墨菲 (R. F. Murphy) 将其视为社会学的唯物主义<sup>[22]</sup>。莱塞 (Alexander Lesser) 概括斯图尔德的社会进化为单线发展论<sup>[22]</sup>。哈里斯 (M. Harris) 赞赏用文化唯物主义原则解决文化比较的具体问题<sup>[23]</sup>。吴文藻在肯定斯图尔德将自然科学引入文化研究的意义的同时, 指出社会科学有其自身规律, 只能用自然科学规律解释而不能完全用自然科学规律替代<sup>[24]</sup>。黄淑娉等认为人类学研究应该注意文化对环境的适应, 但只讲技术, 不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是不全面的<sup>[25]</sup>。笔者认为, 斯图尔德建立的文化生态学奠定了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基础。他首次将生态学原理引入文化研究中, 发现了文化与环境因果关系并系统论证了其对于人类社会组织的作用、类型与意义, 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其文化适应自然的方式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应的观点值得肯定; 他以整体观点研究人口、居住条件、家庭结构、土地利用及其他资源与技术发展等相关关系, 比就文化论文化或孤立地考察文化因素增长的观点有很大进步。他所确定的以特定环境下特定行为模式关系作为文化生态学研究主要内容观点, 尤其是确定区域“文化内核”是与生存和经济行为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文化, 并认为必须对其进行详细研究的指导思想, 都极具前瞻性。这一切均比其前的社会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偏重人类生物学研究, 以及从中未能离析人类文化现象的方法是巨大进步。只是其将社会文化变迁看做是环境单因素的线性结果是极为片面的。

必须指出的是, 我国学者很早就也注意到文化生态方面的研究。自 20 世纪初叶起, 李大钊、冯友兰、梁漱溟等在探讨文化生成机制时, 就力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差异性、民族性, 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sup>[26][27][28]</sup>。虽然其共同的缺陷是没有把文化生态看做动态系统而是静态研究, 但启发了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省。20 世纪 50、60 年代我国曾出现民族调查高潮, 文化生态研究一度活跃。林耀华等撰写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为其时的典型之作。近十年来, 在文化生态理论指导下, 相关的实践研究迅即增多, 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文化生态学理论研究<sup>[29][30][31][32]</sup>。的确, “全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可看做是各种文化不断地适应其境遇的变迁历程”<sup>[33]</sup>, 因此, 文化生态学研究意义日益显现。

### 3. 源于生物生态学的文化生态理论

如果说斯图尔德创立的文化生态学带有更多文化史或文化进化的特征, 那么作为文化生态学重要理论与方法来源的生物生态学是从其另一横断学科——景观生态学中展开对其研究的。景观生态学 (Landscape Ecology) 是 1939 年德国学者特罗尔 (C. Troll) 提出的, 并在中欧得到传播<sup>[34]</sup>。经过 40 年的徘

徊，于 20 世纪 80 年代得到振兴。景观生态学主要研究由许多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景观空间结构、互相作用、协调功能以及动态变化<sup>[35]</sup>。也有人认为它是地理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sup>[36][37]</sup>。其理论的重要概念模型包括景观基质、斑块、空间镶嵌体、廊道等。

由于文化景观具有广义景观的含义，或者说景观包括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而且现代社会环境中景观的文化蕴义越来越鲜明，因此景观生态学在最近十年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sup>[38][39][40][41]</sup>。伴随国际景观生态协会（IALE）于 1989 年成立文化与景观分会，相关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日渐增多。人们认识到，在人类文化发展进化过程中，“人类技艺”已成为巨大的地质力量，它通过建设与破坏作用于景观；文化对景观有深刻的影响，不仅反映一定时期人们的经济价值，而且反映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形成文化景观的精神价值、伦理价值和美学价值；文化既是一种资产也可能是一种负债。当文化内容的共有准则与自然规律相符时，符合生态持续发展要求时便是资产，否则就是负债。人们通过加入“文化特征”影响与改变生态系统，但是，文化与景观的关系是互相的。文化不仅改变景观，而且通过景观来反映；文化与景观在一个反馈中互相影响文化建造各种景观，同时景观影响着文化。文化特征总是与一定的景观相联系<sup>[42]</sup>。在景观生态学领域，以色列的纳沃（Z. Naveh）、德国的葛尔斯曼（W. D. Grossmann）是较早重视文化与景观关系的学者。日本与加拿大等国的有关研究人员关心景观的心理效应与生理效应，研究了景观美学以及景观的感知。美国纳索尔（J. I. Nassauer）提出了景观生态研究学中文化研究方面的四条主要原则，即人的景观感知、认识和准则影响景观，并受景观的影响；文化习俗强烈地影响着居住景观和自然景观；自然界的文化概念不同于科学的生态功能概念；景观外貌反映文化准则<sup>[43]</sup>。我国学者南忠仁基于人类生态系统的热力学分析，导出人类生态系统之熵变公式为： $dS = dS_i + dS_e + dS_h$ 。S 为系统的熵，dS、dS<sub>i</sub>、dS<sub>e</sub> 和 dS<sub>h</sub> 分别表示系统的总熵变、内部熵变、与外交换的熵变和由于人类的技术行为所影响系统内部的熵变。进一步考查 dS<sub>h</sub>，则有  $dS_h = f(dS_i, dS_e, t)$ ，t 代表时间<sup>[44]</sup>。这定量地表达了人类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sup>[45]</sup>，也充分体现了文化生态观点。我国学者对民族文化景观研究的实践表明，不同民族由于历史等原因，人口质量、结构和生产技能呈现较大差别。结果相应地在社会经济系统，如产业结构、投入产出、社会组织与传统观念等方面也有所不同。但都通过长期的环境感应，建立了自己利用、改造生态环境并使之与人类社会本身协调发展的知识

体系及其相应的文化生态系统<sup>[46][47][48][49][50]</sup>。

由于景观生态学不仅仅借鉴生态学的理论，还充分吸收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定量分析景观空间组成、空间构型、空间相关，这对建设完整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此外，从根本上说，两者研究的对象和构建新型的景观生态系统的目标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相关概念可以对应理解。例如，基质相当于区域主体文化景观；廊道不过是特型景观；空间镶嵌体意同于文化生态系统空间结构等。但是景观生态学毕竟长期偏重景观的自然性研究，加之对景观历史过程的关注不足使其原生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于文化生态学。它对文化生态学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后来提出的一些文化与景观关系原则，且已有景观生态学者意识到，文化的景观生态学方法应该置于景观生态学的中心地位并呼吁景观生态学的整合<sup>[51]</sup>。

#### 4. 源于社会学与哲学的文化生态理论

几乎与文化人类学同时，19世纪社会学界也特别垂青文化生态研究。20世纪中后期，随着文化研究向多学科的渗透以及全球生态危机意识增强，使社会学家深入认识到社会文化现象与自然环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学家重新审视人类行为的生态学基础。在这方面，作为社会学后起之秀的文化社会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文化社会学家与文化哲学学者一致认为，从宇宙整体性看，人类的社会文化创造仍是宇宙中的一种自然力；从自然界的普遍存在与联系上说，人类既是创造活动的主体，又是对象世界的客体；人类活动受外部环境制约，是不能选择生存环境的。人类只是一定环境总生命网中的一部分，并与物种群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超有机体的文化因素的引进，使其上又建立了文化层。这两个层次之间交互影响，形成生态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既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影响社会文化的创造。由此形成以人类为核心，人类的文化创造为层次，外围是自然环境的文化生态系统结构模式。司马云杰运用不同类型的历史文明、村落文化生态系统以及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的实例说明了文化生态系统客观存在以及社会结构与文化现象分析的实际意义<sup>[52]</sup>。有关实证研究表明，生态失衡并非相关民族文化正常运作结果，而是族际关系失衡或相关文化转型而诱发的灾变<sup>[53]</sup>。应该说，无论是社会学界还是文化学界，在如何从文化理论与文化建设的实践结合的层面探讨文化生态问题，依然是薄弱环节。比较之下，梁渭雄、叶金宝<sup>[54]</sup>、袁国友<sup>[55]</sup>、王海生<sup>[56]</sup>等工作是有益的尝试。

人，历来是哲学关注的中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始终是哲学的重要命题。文化哲学认为，文化的历史是人與自然界不断实现双向适应、

不断完成本质统一的过程<sup>[57]</sup>。由于文化的现象与文化的本质是同一的，从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关系研究中就可能找到认识文化本质的途径<sup>[58]</sup>。人类是以实践途径、文化的方式而使人与自然发生关系，同时自然通过对文化的选择实现对人类的制约<sup>[59]</sup>。哲学上的人类环境，既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总体上的文化观念。无论从自然的角度的还是从社会的意义上看，文化与环境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偶然聚集的，更不是静止不动的。其各个因素在总体的综合变化中，既显因变量的性质，也呈自变量的性质。即每一因素的自身变化是其他因素变化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成为其他因素继续变化的原因<sup>[60]</sup>。人类生态文化系统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与信息传输存在普遍的联系之中。作为对可持续发展支持性回应，文化的负效应引起人们更大重视。回眸文化生态的历史路程与经验教训，展望人类未来，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今后人类社会必将进入生态文明社会，其对应的新文化就是生态文化。这一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倡导尊重自然的文化，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因此有人主张用“生态化的生物产业社会”一词替代流行的“信息社会”一说，并确信生态化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sup>[64]</sup>。更有学者提出“反育自然的文化”概念，深刻指出，人类文化进步、人地矛盾的解决，“都必须以维护人同自然所构成的文化系统的整体性的同一（或统一）为基础”<sup>[65]</sup>。近几十年来，社会学与哲学界围绕文化生态问题始终在争论“人类中心主义”是否是人类发展的正确价值取向，以及随科技发展，人类与自然关系是趋于“密切”还是“疏远”的问题<sup>[66][67]</sup>。多数学人愈益倾向地认为自然界一方面随文化发展而递减着它对人类及其文化的影响力，一方面又随文化发展而扩大它对人类及其文化的影响力<sup>[68]</sup>。可见，文化社会学与文化哲学中文化生态理论具有全景透视性与方向指导价值。他们有关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模式、有关文化价值与自然价值相对性观点、辩证发展与普遍联系的思想对文化生态学学科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几乎在半个世纪前人类自觉生态意识涌现的同时，历史学中生态学派加入了对文化、文明与区域环境关系的研究。汤因比一反文明源于优越环境的传统之说，提出文明源于困难环境以及文化发展与环境变迁的“挑战”“应战”论<sup>[69]</sup>。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布罗代尔则力证影响历史的三种时段，即政治、军事、外交等短时段，经济、人口等中时段，环境、生态等长时段影响。认为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sup>[70]</sup>。强调了文化的时空考察和理解，也即文化生态观。近年来，从西方到我国以区域为导向的生态历史研究的极快发展，从另一侧面佐证了文化生态研究的重

大意义。

## 二、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的新构架

基于前面的研究述评，笔者试图吸取相关学科有关文化生态理论研究的精髓，并进行一定程度的综合，充分发挥文化地理学对文化生态的研究优势，构建新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这种构建并不排除现有各自理论在相关学科的运用，只是力图使文化生态学理论更加丰满完善，更加突出文化地理学学科特色，强化文化生态学统一的学科形象。

### 1. 概念体系

#### (1) 文化景观与文化群落

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相对，可定义为：人们基于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而形成的具有文化要素叠加的地域存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文化景观的实质是自然景观上叠加了文化要素，从而使其作为系统单元时，不仅是自然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且存在文化要素内部关系以及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的关系；文化景观的表象可以是直观的实体，如物质文化景观，也可以是抽象的存在，如精神文化景观。但都落脚于地域，因此是客观的地域存在。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核心之一就是透视文化景观两种表象的关系。文化群落一词通用已久，但一直未能很好地界定。笔者理解其含义为：存在于一定地域并由具有衍生联系的多种文化或一种文化中多种文化要素（事象）组成的文化有机复合体。可见，文化群落与文化景观两个概念的差别在于，前者是集合的概念，后者多指单一或独类的文化事象。文化群落是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2) 文化生态系统

笔者将其作为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认为这比简单地将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作为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和贴切。事实上，关系寓于系统中。人地关系研究不置于文化生态系统中进行，只能是人地关系理论，不可能提升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同时，由于人地关系过于复杂以及科学发展的限制，在较长时期将停留于哲学观念上。文化生态系统系指由文化群落及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含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显然，文化群落是其中的主体。存在于文化群落中的特定的文化要素，则以其他文化要素为其社会环境。由于文化源于人化，广义的社会环境又可称为文化环境。所以，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均由特定的人群及其文化群落、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组成。简言之，文化生态系统就是人、文化与物质环境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各部分（要素）以受制整体又牵制整体的方式发生作用（见图 1-1）。或

图 文化生态系统示意图

者说，文化与其环境之间存在生态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就是文化生态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直接相关的概念是“文化生态位”，由它指证文化生态系统的稳健度。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文化生态系统也有它的结构与功能，只是具体内容有所不同罢了；更有平衡与失衡问题，只是形式有别罢了。需要区别的是文化生态和生态文化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是基于传统文化的生态形成而言，同时寄意传统文化的生态过程，倾向于传统文化形态，是以微观的视角，面向特定区域或地方的概念，可以概括为区域传统文化在特定生态环境中孕育的过程与状态。生态文化则是立足现在面向未来而构建的一种人们视角，面向环境生态文化，以角区特区现化面向未来人们处。这d 0 (透)d 0 j (文) T面概 # 角区区 0 g 0 1 0 g 3 T 0 . 8 这 0 T J d 0 (面) 化

径<sup>[5]</sup>。经济基础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自然生态变迁影响。文化变迁是文化生态系统演化的直接原因与重要动力。而文化变迁的动力尽管具体地是千差万别的，但根本的是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的生产力水平发展的结果。换言之，文化变迁既构成区域文化生态系统演替的核心内容，又随区域文化生态系统演替而发生。

#### (4) 文化区域

区域是整个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文化区域又简称文化区，指以文化景观的独特性而区别周边的一定范围地域实体。它是文化景观、文化群落以及文化生态系统的空间载体，并以其位置、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等赋予它们基本特色。基于文化区域的文化空间分异和文化变迁组合成文化时空耦合，体现文化地理学研究文化的特色。文化区域与区域文化含义不同，分别强调“区域”与“文化”。前者可解释为依据文化要素划分的区域，后者特指存在一定区域的文化。

### 2. 基本理论

统一的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除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理论外，还包括系统结构理论、生态功能理论以及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这种理论构架必将显现文化生态学独立学科的特色并进一步增强其理论的实践操作。以下重点阐述笔者发展的后三种理论。

#### (1) 系统结构理论

文化生态学将系统论运用于其理论构建，集中体现为承认文化是一个系统整体。由文化亚系统与其地理环境亚系统组成了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组分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显然，构成文化生态系统的文化亚系统及地理环境亚系统均有自身的系统结构。而在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中，最活跃的部分是人群。特定的人群集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分解（破坏）于一身；诚如前述，文化生态系统的环境既有自然环境也有文化环境。随文化生态系统的演进，文化环境在其结构中的地位愈益强化。在文化生态系统中，文化链或文化共生有重要意义<sup>[58][71]</sup>。如果说自然生态系统主要是通过食物链而产生动态变化的话，那么文化生态系统则主要通过文化链、文化共生使其各组分发生关系并产生动态变化。这些都是文化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鲜明差别所在。系统结构的维护是任何文化生态系统平衡与演进的基础。系统结构的优化则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目标。

#### (2) 生态功能理论

作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支撑之一的生态功能理论的要义包括：文化生态系

统有其生态功能，它可以分为基本功能与特殊功能。其基本功能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即为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以及生物间的信息流。但即使这些功能在内容上也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表现为人类大规模生产性的参与。文化生态系统的特殊功能是文化信息流、调节规范功能、社会与人的发展功能等<sup>[72]</sup>，以及文化的生态环境功能，即区域文化对于特定环境的生态促进或削弱作用。特殊功能体现了文化生态系统的根本属性，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可见，文化生态功能不同于传统的文化功能论，是置文化于自然系统和人文系统的动态功能论。只有充分认识了文化生态系统的特殊生态功能并通过对其深入研究，才能真正掌握文化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并预测其未来走向，服务于文化生态系统的创新建设。

### （3）景观感知与景观映射理论

这一理论主要从心理学，尤其是心理人类学家卡丁纳（A. Kardiner, 1945）的“基本人格”论拓展、引申。笔者认为，在文化生态学中其主要思想是感知主要是文化的，绝非纯本能属性，即感知直接与文化相连；人群对景观的不同感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景观不同的评价与不同的开发模式；由于感知是主观的，不同人群对相同景观的感知结果并不同一；感知又受景观的影响，因此它们是交互影响的，结果景观被感知所印染；受感知印染的景观像镜面一样，能映射出其制造人群的文化特质。从这点上说，文化与其环境具有共生与互相写照的关系。事实上，景观感知与景观映射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文化生态系统中文化景观的形成、文化群落结构以及区域文化生态系统的特征阐释<sup>[43][2][73]</sup>。只是一直未作上述归纳。

### 3.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依据上述，可以认为，文化生态学是以文化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文化群落与其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传统文化生态研究强调文化与其外部环境关系研究，现代文化生态研究则同时也重视文化之间关系研究，这样能更好地透视区域文化特点及其真实生态位。事实上，文化不仅衍生于自然环境中，文化景观与文化群落内部及其之间都有深刻渊源与联系。因此我们认为，概括来说，现代文化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如下。

#### （1）主要研究内容

现代文化生态学立足区域，从三个层面探讨区域文化群落与其地理环境的发生、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第一个层面，我们称为宏观研究。重点探讨区域文化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关系。由于这是一种双向关系，文化在其中扮演双

重角色，因此，一方面要研究地理环境对区域文化特质形成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区域文化在其发展阶段中对地理环境的不同影响。既关心这种关系对区域文化变迁的积极意义，更关注它对区域文化变迁的消极影响。阐明这种双向关系、双重作用对区域文化成型及其变迁的不同效应，是地理学研究文化生态特色所在，也是文化生态学传统的研究领域，构建区域文化生态研究大厦的框架。显然，区域文化赖以形成的地理环境背景研究是其基础研究之一。同时，由于文化生态系统有明显的历史积淀性，文化生态的宏观研究也必须以区域文化生态的历史演进为基础。

现代文化生态学的中观研究，探讨文化三大层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相互渗透、互为表里的关系。揭示它们通过地理环境的作用所形成的有机联系性与系统整体性。以文化群落为载体，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域及其文化群落进行深入剖析，中观研究为宏观研究提供材料与佐证，构建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主体。

文化生态学的第三层面，是其微观研究。面向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或制度文化各别文化层面，研究其内部各文化景观产生、发展的互相影响及其各自特质的形成与地理环境的感知、影射密切关系。着力分析区域人群对景观感知以及景观所影射的区域文化特质。正是各别文化景观所蕴涵的文化特质的抽象概括拟构区域文化特质，因此，这种研究服务于上述宏观与中观研究。其对宏观研究的贡献在于，抽象出最基本的文化质素，成为提炼与认识区域文化特质的基础。对中观研究的意义表现为文化景观的深描夯实着三大界面文化研究内容。可见，现代文化生态学三大研究层面是逐层递进、逐步深化的（图 1-2）。

固然，文化是人群的文化，它只有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才能形成与发展。所以，现代文化生态研究目的是研究区域人群（族群）在创建区域文化过程中，如何通过感知地理环境、开发与利用资源、改造自然界形成区域文化特质与风格的；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以区域文化为中介，研究人地关系的协调程度如何；在肯定和谐一面的同时，主要揭示不和谐一面的文化潜因，为地方政府在资源利用、文化建设、旅游开发、人口控制、产业规划等方面提供决策参考，从而有益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这也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意义所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如作为文化地理学分支之一的文化景观研究以土地利用方式、聚落形态、资源利用方式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样，文化生态学亦应重点研究土地利用方式、聚落与居式等文化景观的生态蕴义。对现代文化生态学研究，其中适应地方的自然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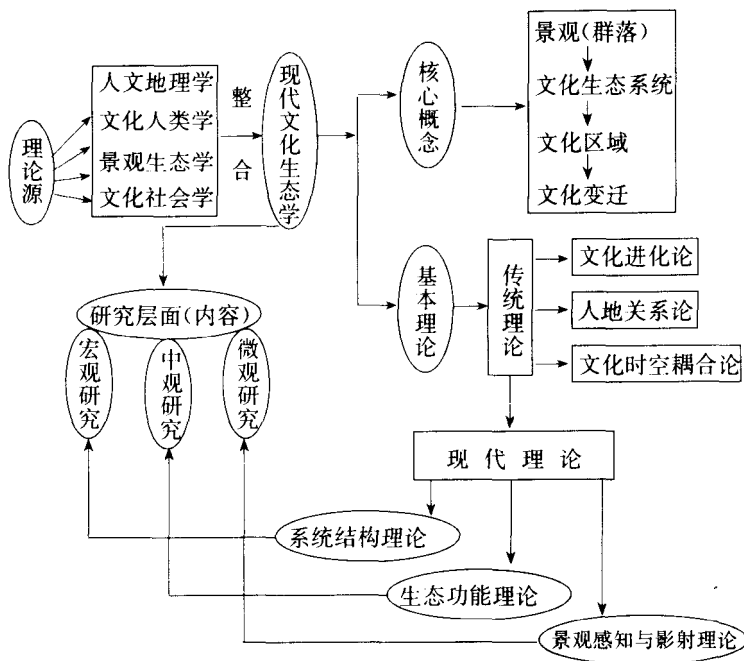


图 1-2 现代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构架

综合开发利用又是重中之重。未能认识到这些，是文化地理学领域研究文化生态长期滞留于泛化的人地关系研究而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因为文化景观研究毕竟是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基础和优势所在；也只有这样，文化地理学方能真正发挥研究文化生态的学科优势并牢固地将文化生态学内化为其分支，与其他分支尤其是文化景观研究构成有机系统。

本书即以上述框架为基础，只是限于时间和篇幅，考虑研究区域特色，同时为突出重点，本书以中、微观研究层面为主，选取的研究内容也有所侧重。诚然，作为独立学科，文化生态学还有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但其主要内容显然是区域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众所周知，区域可从不同角度分类，如依地貌分为山地、平原等，依聚落分为城市、农村等，依文化群落在广东可分为客家、广府、福佬等。这样，文化生态学的下级学科就有所谓山地文化生态学、城市文化生态学、客家文化生态学等等。

## (2) 主要研究方法

现代文化生态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其具体研究方法来源于上述理论源的主要学科。因此，区域文化对比法、田野调查法、历史文献研究法、抽样调查方法、系统综合法等成为常用方法。近年来，个案研究、统计分析成为定性分析补充的重要方面。内容决定形式，现代文化生态学研究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依据其具体研究内容。跨学科的高度综合的学科属性，使其还将借助 SPSS、GIS 等定量研究手段。

## 第二节 区域相关研究述评

客家，作为汉民族一个民系，广泛分布于祖国内地的 19 个省区，265 个县市。人口总数约 5 500 万。此外，香港约有 125 万，澳门约有 10 万，台湾约有 460 万。在世界其他地区，客家人遍布五大洲，80 多个国家，人口达 500 万。国内客家民系主要聚居于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边区，尤以粤东北最为集中。梅州市客家人即达 480 万。千百年来，客家民系生存繁衍于包括粤东北在内的赣闽粤边区土地上，以其勤劳与智慧适应并改造着区域环境，创造了独特的客家文化生态景观。前人对客家系统研究，以罗香林为肇始，已有 70 年历史。作为民系的整体研究，客家研究自然包括客家文化生态的研究。但至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与客家研究中的源流研究、民系文化的单要素研究，尤其是客方言、客家习俗等研究比较，仍相当薄弱。最近 20 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相吻合，伴随客家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文化研究热的兴起，客家研究迎来了新的热潮。突出表现为研究内容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笼统的民系及其文化现象研究走向文化要素深描，进而转向深度文化综合阐释。同时，由理论研究走向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研究。其中，客家文化与其地理环境关系研究、客家的生态环境和适应方式研究、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特色研究得到明显增强。这些研究可以概括为如下三方面。考虑到赣闽粤边区客家文化同一性远大于其内部差异，区域研究述评立足整个赣闽粤边区，对其统一和相似文化事象研究进行一致的述评，而同时其间差异性将着重倚赖粤东北相关研究，并在对比基础上进行述评。

## 一、地理环境与客家文化演化关系研究

### 1. 客家文化成型的时空背景

客家民系及其文化形成的时间和空间问题不仅与客家源流密切有关，也与客家文化生态相连。问题实际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独立民系的客家和具有独特文化个性的客家文化定格的历史阶段问题；二是合成客家文化的完整地域方位问题。客家文化作为移民文化产物，使此两者相互联系。上世纪初，罗香林关于民系形成的外缘、天截和内演观点，即包含深刻的文化生态思想。

客家文化成型的时空问题争论激烈，迄今没有定论。成型时间方面，主要的观点有：南朝成型说，以吴炳奎（1994）<sup>[74]</sup>、房学嘉（1994）<sup>[75]</sup>等为代表；宋代成型说，以罗香林（1950）<sup>[76]</sup>、陈运栋（1979）<sup>[77]</sup>等为代表；明末清初成型说，以胡希张等（1997）<sup>[78]</sup>为代表。各派观点均有其理论依据，不失为一家之言。笔者以文化地理学视角，强调统一的赣闽粤边区域对客家文化定型意义，认为区域文化的整体成型有赖于其主体要素的各别成熟。从作为客家文化代表的物质文化如民居、梯田的大量出现期和作为典型非物质文化的客家山歌、客家方言定型期，笔者进一步论证了客家民系及其文化成型于明末清初<sup>[79]</sup>。建村历史研究成为客家民系源流研究新途径。对江西兴国县自然村建村历史研究表明，“兴国县的客家色彩，是在明代至清乾隆之间形成，且以清初顺、康两朝为最重要时期”<sup>[80]</sup>。这有力支持了客家源流的明末清初成型说。客家民系及其文化成熟和稳定于明末清初的观点得到日益广泛支持<sup>[81]</sup>。在论及客家民系及其文化源流时，客家文化要素被视为重要研究对象。尤其是客家方言的关注最多。其次是客家山歌、客家建筑、客家习俗等。对这些文化景观的特质的剖析，显然为客家源流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成为客家文化成型期的重要判据。

客家文化成型的空间尚有赣南论、闽西论和粤东北论之争。赣南论认为客家先民第二次南迁大都溯赣江首先进入赣南山区，客家作为独立民系的许多特征如举族迁徙、聚族而居、恪守古音等在南迁赣南时已经出现<sup>[82]</sup>。闽西论实质是强调汀州州治长汀县对于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地位，认为它“抚育了祖祖辈辈的客家人，孕育演化着客家的民俗民风，并向四面八方传播”<sup>[83]</sup>。刘劲峰基于唐末五代纷争与北民南迁的经过、特点的考察，认为唐末五代是客家民系开端，因而，确定赣东南、闽西是客家民系摇篮<sup>[84]</sup>，即客家文化成型区域。马卡丹持类似观点<sup>[85]</sup>。据此，粤东北的客家文化只是客家文化之流，

而不是客家文化之源。有学者则以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强调赣南在整体客家文化中的地位<sup>[86]</sup>。林嘉书在《客家摇篮——石壁村》运用族谱姓氏溯源，论述了石壁曾是历史上大批南迁汉人的集散地<sup>[87]</sup>。有人更进而认为，宁化石壁因“优越、合适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等”（指盆地面积大，开发早，富庶），成为唐末至北宋间客家民系摇篮和客家文化中心区域<sup>[88]</sup>。然而，赣闽粤边区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主要区域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sup>[88][90][91]</sup>。徐旭增早就列出 55 个县（市）的“客家大本营”区域<sup>[92]</sup>。胡希张认为，赣闽粤广阔地域的不同地区对客家文化历史形成的贡献不同，以梅州为中心的十多个县是客家民系的最后成型的地方，可以称为“客家腹地”；客家文化是在与土著的不断融合中完成的，这一过程，始于赣南，发展于汀州而成熟于梅州<sup>[89]</sup>（同上）。必须注意，文化中心随文化变迁是会产生空间转移的，故要区分历史文化中心和现实文化中心。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中心。成型空间不等同于现在的文化中心，只是历史上文化的合成区域。以“小三角”作为客家文化形成的共同地域，则“大三角”（指南至海南岛三亚市、北至四川广汉、东至台湾彰化的空间范围）只是客家文化播迁区域。

就客家文化成型方式言，历经了黄节（1905）与乌尔葛德（R. P. Wolcott, 1920）等的“异族论”、罗香林等的“汉系论”<sup>[93]</sup>、王增能（1989）等诸学者的“融合论”<sup>[94][95][96][97][98]</sup>以及房学嘉（1994）“土著汉化论”<sup>[75]</sup>等论争。“异族论”在上世纪前期曾经盛行，但很快在高层文化的批评下销声匿迹。客家“汉民系论”则由于迎合了广大客家人的心理与其时现实需要，统治客家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乃至上世纪末仍有学者认定“客家本来就存在北方，是生活在北方的土著”<sup>[100]</sup>。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随着田野调查方法在客家研究中的应用，同时客家研究理论自觉性增强，客家民系及其文化形成的“融合论”为众多学者所主张。赖雨桐（1996）指出，梅州客家文化在其漫长形成过程中，吸纳了多元文化成分，构成其特质<sup>[99]</sup>。广府、福佬、客家三大民系（族群）文化比较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sup>[101][102]</sup>。从大的方面说，房学嘉是赞成“融合论”的。只是在客家民系（房学嘉称“客家共同体”）构成上，主张以土著居民为主，因而其实质是主张客家民系及其文化是“土著汉化”的结果。笔者认为，房强调土客文化融合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稳健区域文化的形成必须与民系适应区域环境为前提，移民文化的形成尤其如此。否则不是就地泯没，就是被迫移位。这在客家文化的主体文化要素的特征及其形成过程中也可以看到<sup>[79]</sup>。此外，“土著汉化论”突出了区域文化之所以成型于区域的个性由

来，从而也易于使人把握客家文化区域特质。但对客家民系而言，究竟以“中原流人”还是以土著为主体，值得商榷。在这点上，《客家源流探奥》似乎依据不足，也未能考虑时间变化因素。因为无论“中原流人”还是“古越族后裔”都是历史的变数。况且一般而论，作为土著的“古越族后裔”均为少数民族，以土著为客家民系主体，难以解释历史上唐至宋期间，客地人口剧增的事实。因为这是区域人口自然增长规律无法说明的，也与其时我国南北人口消长及其成因相悖。此外，由于“阿姆话”主体实乃是“中原古音”，却不是古越语或畲族瑶族语，土著主体论还难以解释中原古音何以成为客家文化特质之一。只能说客家文化“绚丽多彩而独具一格”特质形成，“和百越族文化、瑶畲文化互相渗透、融合”密切相关<sup>[103]</sup>。

客家文化同所有地域文化一样，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笼统谈客家文化渊源于中原显得十分粗浅。由于历史上既有“新生形态的客家先民”，也有“再生形态的客家先民”，客家文化就不是中原文化的单向、简单移植，而是包括淮河流域文化副区、荆湘文化副区和鄱阳文化副区等众多区域文化的多向、复杂整合<sup>[104]</sup>。

客家文化成型的时空问题事关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的起点和范式依据，着眼文化生态学观点，客家文化成型的时空基础更加科学、准确。承认客家是汉民系之分支，就应接受客家文化是汉文化在特定地域的强化或发展的观点，而这强化或发展，“跟客家的长期流徙和屡屡拓荒创业的经历分不开”<sup>[105]</sup>。

## 2. 环境感应与客家文化特质、风格形成

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有较大篇幅论述客家传统文化对其环境的感应研究，着力讨论了客家分布和环境适应方式问题。这在该专著的第3章“客家分布与自然环境”第7章“客家的特性”中有较好的阐发。赣闽粤边区的自然环境，从自然要素分解看，主要表现为：气候方面，高温多雨，降水季节不均；地貌方面，多山，夹以大小不等的盆地；水文方面，河流上游，滩多险急，旱涝频仍。这种生态环境给客家文化特质、风格以深刻印记。例如多数学者肯定，恶劣的山地环境，不适宜种植，物产相对较少，是造成客家民系性格刚毅、吃苦耐劳的基本原因，也是驱迫其外迁拓展的因素。同时，绵延山地造成的环境相对封闭，“比较能够保留他们的固有语言和习俗”<sup>[93]</sup>。即在客家文化生成与保存上有重要意义。河流上游的区位，对客家民系的顺流外迁，尤其是第四次迁移有密切关系。罗香林认为，“客家第四次人口的迁移，究其原因，纯基于族内人口的过剩及外地经济的诱惑，然其迁移的引线及其方式与步骤，则与此等特殊河流至有关系”<sup>[93]</sup>。也即客家垦殖民系的特